

热点丛书

苏廷海著

通天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目 录

1. 通天状 (3)
2. 他到底得罪了谁? (43)
3. 掐不断的翅膀 (91)
4. 谁主沉浮 (131)
5. 特字号要案 (165)
6. 苍天在上 (203)
7. 苏廷海和他的报告文学 (252)
8. 后记 (269)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堪称是一部“风雨集”：全书每起案件的采访、揭露，及至今天的出版，无不充满着风风雨雨。除了案件本身内容有较强的可读性外，每个案件向社会曝光过程，也成了一个个动人故事。

几度春秋，几经磨难，这部“风雨集”终于问世了。但愿它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深沉的思索。

通 天 状

这起案子，曾经单写成一个中篇。当时，一个省级文学刊物的副主编看毕此稿，拍案叫好。当即要拿走头条发排。我摇摇头——嫌他刊档次略低。遂寄北京。《中国作家》一位著名编辑拟定尽快发出。然而，当时的政治气候使一些人心有余悸。此稿一搁就是一年多。《法制导刊》将此稿拿去，一位副主编破例同意给半本杂志的版面，并拟为此稿专设奖励。但终审又未获通过。天津《蓝盾》慧眼垂青，可发稿时依然羞羞答答，删去很多。且将题目《通天状》改为《且从十五头黄牛说起》。气势磅礴的中篇弄了个杂谈标题——犹抱琵琶半遮面！

《法制文学选刊》“不信邪”，仍以《通天状》为题转载。虽将尖锐的三分之一内容砍掉，几个月后，这家刊物仍然被吊销了刊号！

现将原稿全文发表于下，请细心的读者看看，这些文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它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有“毁我长城”之嫌？

中国人，人云亦云者太多，赶“风头”、赶“浪头”者太多。一些文人的错误被整，还不是另一些文人所致？当一些人叹息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窝里斗”，殊不知他自己就是窝里斗中人！

这起案子，是笔者自认为揭露的诸多案子中，很值得炫耀的一个。因为在采访、亮相过程中，它教给我很多东西。

——文前小引

通天状

这是一份状纸。因事关全文，摘录如下：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同志：

你们好：

今朝明土匪，法院当帮凶，县长推血磨，银行徇私情。民告状，叫天天不应，卷宗纸篓扔！万般无奈，特奉献老百姓的心爱之物——耕牛 15 头，给首长元旦春节饮酒下菜用，盼与民说话。所献给耕牛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纪委、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嗨！“送礼”送到总书记、国家主席头上。——并且是“公开行贿”，这人吃了熊心豹子胆？

这事发生在首都。

发生在 1986 年元旦——一个狂欢之夜。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司法机关——司法部门口。

夜幕下，梧桐旁，15 头黄牛膘肥体壮，披红挂彩。它们身旁，一个黑提包里，装着的就是这份状纸，还有给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制的 15 面绵旗——案没完，道谢的锦旗便送来了——显然是催逼！

古今中外罕见的告状案！

北京被轰动了。

全国被轰动了。

外国驻华记者，也伸出了灵敏的触角……

尔后，批复，结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然而，一桩小得可怜的经济纠纷，何以闹得如此轰动？在这场告状史上的奇迹出现后，我们有没有必要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如果仅仅为写写这个案子，写告状人的胆大与精细——尽管它一定拥有众多的读者，我决不提起这支笔。因为太沉、太沉；

如果仅仅为了颂颂领导者为民伸冤的大功大德，我决不铺开这张纸。——因为它太薄，太薄；

我沉默了一年，思考了一年，孕育了一年。究竟要反映些什么？

请耐心的读者随我先走向这案卷之外。

第一章 中国第一难

他是谁？我是谁

压过来座座云山，让人有窒息感。闷。

我想透点气，慢慢向门口踱去。

“扑通”！一个老汉重重地跪在我的面前，两只昏花的老眼，闪着泪光。

这是我父亲吗？父亲一样的年龄，父亲一样皱纹纵横的脸，父亲一样粗糙黝黑的肤色！

“求求您了”！眼中是哀怜的光。

我愕然！忙把大爷一把搀起。

他是谁？我不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唔，明白了，看着他满怀深情地瞟着我们大院门口的两块大牌子——“新华社××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我知道，这又是一位不幸的告状者！

中国人的膝盖是不软的。可是，当他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他会习惯地用最古老的跪求，向任何他以为来自上边的人乞求公理，乞求明断。啊，我的淳朴的父老！我一把将老人扶进办公室，递给他一杯茶。

老人泪和着诉，诉掺着泪，无休无止……

我叹息，长长地叹息。我把目光飘向窗外，我首次中州之行的几个记忆点——

开封宾馆，我刚洗完澡，一位告状的姑娘便敲响了门；

到平项山，我约计委的同志晤谈，他竟同时带来个上访

者；

转赴南阳，刚刚接上头，告状的一天便来了三个。

告状者究竟有多少？一个上访者告诉我，他在北京上访，夜里两点开始排队，中午 11 点——10 个小时之后，才拿到一张签印的“转状条”；据最高人民法院透露，近一年多来，他们平均每天要接待 130 多位上访者，统计资料表明，近四年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和 29 个省市、区党委人民政府的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近 1200 万件（次）。平均每天近万件（次）。

上访者何以这样多？重要原因是一个字：难——告状难。下边冤，盼上边，上边推，只好状告通天。再不通，只好一而再，再而三。

贵州省仁怀县一位女交通监理员，为一起小事无端遭受各种打击，已上访五年，问题至今未解决：

湖南农村的一对夫妇，在西南边陲养蜜蜂，被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抄了家，人也被打成终身残废。他们四处告状，毫无眉目，从文革到现在，已告状 1200 次！

青海省办公厅副主任的儿子杨小民杀人案，被害者家庭提着血衣四处告状，最高人民法院共六次批示，直到中央领导出面，才得以依法审理。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共接待人民来信来访 15 万件（次）。到年底，仅刑事申诉案尚积压 11 万件（次）未能结案！有多少告状者由希望，失望而再期望啊！

说到告状难，一般是指到政法、纪检机关告状难，这些，报刊上已披露甚多，不再赘述。现在，咱们独僻蹊径，从舆论界——这个“内行人”认为告状容易的部门，来反映告状难这一

主旨，想来读者更感兴趣。

在郑州，我曾遇到这么一位可笑的告状者——一位老大爷，戴了顶掉沿的破草帽，草帽闪着霉绿色的暗淡。

老人不象那些萎萎缩缩的来访者，没有一副乞怜相。他倒象走进了自己家一样随便。

他推开门，也不问话，把一张纸递给我，拉把沙发椅，扑通坐了下去，接着，摘下破草帽，“呼哧呼哧”扇起风来……

他递给我的，是一封介绍信，因其奇特，抄录如下：

新华分社：

我乡农民×××因和邻居产生土地纠纷，久未解决，特去向贵社反映，敬请接洽为盼。

××乡人民政府×月×日

看着这封写得公公正正且盖着红印章的介绍信，一丝悲凉吞噬着我。

土地纠纷，充其量是行政村就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堂堂的乡人民政府竟写信求助新华分社，这个信倒怎么能下得了笔？这枚印盖上去不感到烫手吗？

“这个……”我摇摇头。

“咋？”老汉停止了搵草帽：“你们不管？咱乡长可是说找你们就中哩！”

老人走后，我感到可笑。现在有些人迷信舆论机关，好象在报上捅一家伙，百事就了了。

一般老百姓这么想，倒还情有可原，可堂堂的政府也这么想。更有甚者——

湖南省溆浦县先锋村党支部副支书等三人无端被逮捕，为其辩护的律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接待者认

为：“此案应该彻底平反，但你最好去找下舆论部门，要借助舆论的力量解决问题……”

——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舆论界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下边的人当然更是深信不疑了！

也许，湖南那家已告状 1200 次的上访专业户没找过舆论界；也许，安徽省委门口那两个孩子——一对纸帽写着十个“冤”字，胸前背后都挂满了状纸的孩子，没找过舆论界！

舆论界！舆论界！——舆论界的苦处有谁知？

人民来访概不接待

十年前，我也曾是一位告状者。当然，也是舆论界的忠实信徒。

我写人民来信，说来颇光彩——

那是一个三伏天。虽然“四人帮”已被打倒，矿山的空气却依然沉闷。我仔仔细细地探究闷源——原来是极左余毒还在蔓延。天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可矿上还要让矿工们坚持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缺一次就扣全天工资，迟到早退一次，就要扣五毛钱。矿工早上四点钟爬起来，在地底下劳作一天，下午四点才能摸顿饭吃，接着就要在那里打着瞌睡“学政治”，直到日头全落下山。三伏酷暑，咱坐机关，吹着“华生”“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混半天”都受不了，那些两年前前平常和我同推一辆矿车的弟兄们能是铁打的？

我找矿领导反映，政治学习不能卡得这么死，矿工实在休息不好。矿领导双手一摊，表示毫无办法，说是局里统一规定的，将来评大庆式企业，这可要算一条啊！

我灵机一动。很快，一封《伏天矿工的政治学习应暂停》的人民来信飞到了北京。

这次公文旅游可真快。不到一月时间，这封信又转了回来，上面盖有五枚印章：

人民日报社转安徽省委

安徽省委转淮北市委

淮北市委转矿务局党委

矿务局党委转矿党委

矿党委负责同志，又把来信转给我。他批评一顿，我顶撞一顿。

可惜我本性难移——

党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知识分子入党。我们矿共有四十名技术干部，包括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在内，总共只有一名党员，还是从部队带回的党票——问题够严重的吧？

写出来一准轰动，我想。信写了，又转了……写到这里，我耳畔又响起一段歌词：

趁你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

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息，

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几年之后当我跨进某省新华分社大门，带着好奇的目光环顾四周时，传达室门口一块黑漆写的牌子，使我惶惑了：

因本社(站)业务繁忙，经请示领导同意，本社(站)概不接待人民来访，有来反映问题者，请找当地党政部门解决。

新华社××分社

人民日报××记者站

我的心一阵颤栗。新华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是中央机关的派驻机构，是党和国家喉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对她怀有多么崇高的敬意，抱有多么大的期望啊！一块木板子，岂不就割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即便是确实接待不了众多的来访者，也万不该挂这么个令人寒心的招牌呀！

分社领导叹着气向我作了解释——

如果接待来访，分社几十位同志所有的工作不干，都接待不了；再说，如能解决问题，我们多忙点倒也痛快，可气的是：转信，大多是石沉大海；调查，象揭那些“土皇帝”的疮疤，他多方阻拦你。调查十天半月，写成稿子，怎么发？一般的申诉，是不能发通稿的；内参，也必须具有典型意义。不然，领导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看？再加之个别人反映情况不实，个别人事后不认帐，个别人明明有错，却胡搅蛮缠，新华社不能老和人家打官司呀！

他举了个较典型的事例：某地区严重受灾，秋末已有 30 万人缺粮，几万人将面临逃荒要饭的险境。新华社记者王彪跑遍了该地区九个县，访问过 20 多个受灾严重的村庄，写了份内参。习仲勋、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赴这个地区调查。

这下惹恼了省委某负责人，认为给这个省的大好形势抹了黑。后来，提供情况的地委书记在高压下竟也改了口。这下好了，王彪竟被召进了中南海勤政殿里打官司，省领导也把分社社长召去质问……

分社领导捋捋已经愁得稀疏的头发，重重地唉了一声：“反映问题，难啊”！

这一声叹息，勾出我几多感叹。是啊，唱赞歌，吹喇叭，笑

脸相迎，热情款待。想揭问题，对不起，层层设阻，内外来压。被揭者翻脸，有关领导护短，新闻部门担不尽的风险，可真是，采访难、审稿难、发稿难！最头痛的，最可怕的，就是这“发稿难”！

如写的是案件，签发者要看是否结案？如果揭露某领导签发者要问给没给被揭者审查。如果反映的是问题，签发者要问是否有定论，是否送有关部门把关……

这也不能怪签发者苛刻，凡发的揭露性稿件，每篇几乎都是一场官司，到时追究起来，谁负得了责？

我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时，曾编发过这么一篇稿子，揭的是某位科级干部虐待妻子另寻新欢的丑事。一篇稿子上，盖着四枚红通通的大印。我和分管副总编都认为，“这小子算是作恶到家了”，不然，四个部门为何一齐同意公开谴责？

哪知，稿件编发后，被揭者闹上了门，四个盖大印的部门竟也分别赖了帐：或说稿件没看，或是没看清、或是记不清了……

想想，四枚大印看不住帐，这个编辑还怎么当？

发稿难，发稿之难多要打官司，这，记者都不怕，无非多跑点腿，多磨点嘴！

然而，发稿又能怎样呢？

《啄木鸟》编辑部曾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字《被追捕的“逃犯”》，发稿前，“逃犯”所在地的政法机关得知要揭他们，便捎来口信，如不发稿，他干他的营生，我们办我们的案子，两好；如果发稿，啥时发我们啥时逮捕他。

《啄木鸟》不信邪，还是揭他们，果然，如他们所说。

《啄木鸟》几次派人前往交涉，门都没有——你有权发稿，我有权逮人，谁也管不了谁！

河南有一个个体集资小厂，几年前五名厂领导业务骨干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刑。五人多方上诉，新华社记者、河南日报记者、工人日报记者等纷纷出马，为这几位个体户鸣不平。稿件飞进了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多次批示和河南省委的直接干预下，这五人两年多后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法院当众宣判他们无罪。《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一冤案平反的消息，《河南日报》还先后刊登了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和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赞扬此案平得好的意见。

哪知，一年半后，这几人又被全逮进了监狱。根据是中央某机关又有了批示。尽管记者们知道，这种批示所根据的材料是不实的，但想再次平反，谈何容易！

一家文学选刊曾选载了一篇稿件，稿中揭露了税务局某要人的丑行。这家选刊可倒了霉，很快，税务局专门下文，收这家选刊的税！

湖南省长沙市工商局错误处理个体经营的中华百货商店，记者作了揭露。结果，三家省级新闻单位的八名记者，竟为此打了整整三年官司，还遭到诬陷诽谤……

记者，被人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难啊！

有位友人问我：

“中国干什么最难？”

我答：“当工人，农民最难。”

他摇头：“他们艰苦的劳动之后，有收获的欣慰和幸福。”

我答：“造原子弹最难。”

他摇头：“他们有财力、人力、物力的保证。”

“那？”我茫然。

“告状是中国第一难！”他收敛住淡淡的笑意，板起面孔，扣着手指数起来；告状者无人力、财力、时间的保证，这是“前三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这是“中三难”；案难办、办不公，结案后还怕报复怕行凶，这是“后三难”。

哎哟哟，中国告状如此之难，难道就没有一点好办法了？

有。李战军，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给中央领导“行贿”农民，就有他的独特办法。

第二章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礼”

古今中外，奇案纷呈，笔者涉足这片领域，受益匪浅。

在我所接触的告状者中，有的拦车喊冤，有的擂鼓叫冤，有的闹事鸣冤……也有暗暗送礼以求伸冤。然而，象李战军这样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给国家最高当权者“送礼”，以达到伸冤之目的，实属罕见。

不过，我以这起案子为主线，试图反映出中国告状难的现状，推论出告状难将可能产生的恶果，探究中国告状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决非为了把此案作为猎奇的诱饵，有意吊一吊读者胃口，增加一些什么“可读性”。而是因为这起案子太具有典型性了。首先，告状人是中国最底层、八亿农民中的一个代表；其次，这是一起小小的经济纠纷案，却轰动如此之大，且又是在大变革的八十年代。还是请读者先了解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省悟吧。

一桩轰动全国却小而又小的案件

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宋坪村，地处山区，土地大部分被厂矿、铁路及驻军占用。这个村农民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二：炼焦、吃统销粮。

1979年，这个村和河南舞阳县化肥厂建立了购销业务，双方获利，两家颇好。

翌年，化肥厂经济拮据，厂领导带着业务人员专程来宋坪村求援：先支援焦炭，欠款年终保证还完。结果，大年三十才还上5千元，尚欠43万余元。

在此情况下，双方领导订出还款合同：1981年底全部还完，两枚大印蹲在上边作证。

舞阳县化肥厂第二次食言了，1982年尚欠款15万余元。

宋坪村派人坐阵舞阳要帐，可舞阳化肥厂生产不景气，所卖化肥款，全被银行当贷款收回。有一次，化肥厂不知通过何手段，从银行给宋坪信汇了一万元现金，可是，当宋坪去取款时，又被卡住了。说是什么银行经办人疏忽，办错了。

第二年，化肥厂领导班子调整，由工程师王建彬承包该厂。这位王大厂长对要帐者不耐烦了：“老班子欠的款与我何干，我承包合同也没有归还老班子欠款这一项！”——化肥厂开始不讲理了！

再找，连面也见不上了。原来王建彬给全厂立了条规矩：凡有索帐者来，不许任何人告诉厂长办公室在哪，更不许告诉厂长在哪，违者，扣奖金5元！

无奈，宋坪焦厂业务员李战军找到舞阳县分管工业的安

副县长，安副县长倒挺客气：

“噢，这个问题嘛，好办，你们找一下财政。”

财政局答复：“找经委。”

经委主任摇着头：“县政府不管，财政不管，我们怎么管？你知道经委是干啥的吗？我们就象那牛行里边的牛经纪人，只管开会传达文件，牵牵头，既无人权，又无财权，谁买咱的帐……”

李战军搔头了，看来这个帐，难要着哩，他想打退堂鼓。

他找到村领导，哭丧着脸说：“我没这个能耐了，要帐一年多，花差旅费近千元，我自认倒霉，不让公家报一分，请另请高明吧。”

“那不中！”

“中也这样，不中也这样，头掉了大不了碗大个疤！反正我不干了！”

“这样吧，”村领导放下了脸，鼻子眼里都荡着笑：“你再辛苦一趟，找准该问谁要，就再没你的事了，啊，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

看着村领导乞怜的瞳仁，李战军心软了，好吧，墙头上跑马——反正就这一趟了。

李战军确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从平顶山买了部收录机，装上五节大电池，带着五盒空磁带，带着两个人找到了王建彬办公室。

“王厂长”，李战军把录音机放在王建彬的写字台上，按下录音键，发话了：“王厂长，欠我们宋坪焦厂的款归谁还？何时还？”

“归……”王建彬刚吐出一个字，舌头便冻住了，乖乖！没